

# 公諸於眾：淺析同盟合作中的盟友間爭端\*

陳秉達

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助理教授

## 摘要

本文探究安全同盟成員間對於安全合作的爭端，主要目的為瞭解成員在何種狀況下會公開質疑同盟關係，以及公開同盟爭端對同盟關係的長遠影響。國家基於安全需求加入同盟條約，由於盟國的安全利益與履約能力隨著國際政治波動而變化，盟友可能對同盟的效益產生歧見，進而對同盟關係產生爭執。但是將聯盟合作的問題公諸於世，可能使外部威脅懷疑同盟的可信度，因此公開聯盟爭端的出現表示同盟關係出現變化，值得吾人瞭解背後的成因與其影響。本文檢視冷戰間成立的雙邊同盟，分析外部威脅、盟友間國家實力對比、以及民主化程度三個變數，結果顯示，如果同盟不能反映聯盟內外變動帶來對安全利益的需求，或是盟友想要展現解決同盟問題的決心時，盟友會提出抱怨、質疑、或要求改善同盟關係，即使盟國瞭解公開內部不和可能帶來安全風險，他們仍願意提出爭端。本文進一步發現，曾出現公開爭端的同盟關係更容易破

\* 本文曾發表於 2017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由衷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專業的建議與指正，作者亦感謝張文揚、薛健吾、張廖年仲、丁樹範、譚偉恩提供的寶貴意見。本文所有錯誤或疏失，當由作者自負。

收稿日期：2017 年 7 月 18 日；修回日期：2017 年 11 月 18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

DOI：10.6683/TPSR.201812\_22(2).0003

裂、同盟持續期間較短，這表示同盟爭端為觀察安全同盟未來發展的重要指標，盟友能否保持友好同盟關係，端賴於爭端是否獲得妥善解決。

---

關鍵字：安全同盟、同盟爭端、聯盟管理、同盟可信賴度、同盟關係

## 壹、前言

同盟內部為什麼會有不和？本文探討安全同盟在何種情況下容易出現來自內部的質疑與挑戰，並試圖瞭解這些爭端對聯盟關係的影響。盟友認為安全同盟能促進共同安全利益，但是往往要實際合作後才能確認同盟的價值。事實上，同盟成立之後，才是盟友衡量同盟效益的開始，盟友雖有履行盟約義務的意願，但是實際執行依盟友的能力與意願而異，同盟合作並不一定順遂，因此盟友可能在盟約簽訂後產生爭執。一般而言，同盟合作可能出現下列數種問題：第一，同盟締結後，盟友對於合作內容的解釋產生歧異，由於對於盟約解讀不同，盟友對於履行盟約的標準沒有一致看法，認定的目標也可能不相同。此問題常發生於分擔履約責任時，最典型的問題就是防務責任的分擔，美國與北約盟國關於國防支出的爭執便屬此類。第二，盟友可能發現另外一方無力或無意願執行安全合作，隨著同盟關係逐漸揭示成員的軍事與經濟實力，盟友履行盟約的能力可能受到質疑，或是成員有能力卻不願意貢獻，因此產生不和。埃及與北葉門共和國（Yemen Arab Republic, YAR）的同盟便是如此，YAR 在埃及支持下成立，但隨著 YAR 與葉門王室的內戰持續膠著，使得埃及逐漸對支持北葉門失去興趣，六日戰爭後埃及軍力遭受慘重損失，納瑟於是撤回對 YAR 軍事支持。

儘管同盟關係可能處於緊張，盟友可能對其他成員心懷不滿，但盟友一般而言不會公開同盟內部的爭執，這是由於聯盟不和諧會帶來同盟關係脆弱的印象，同盟一旦有不穩固的跡象，潛在的敵國就可能趁機對盟國採取不利的舉動。聯盟內部不合提供第三者分化同盟的機會，敵國離間盟友可能導致聯盟崩潰（劉丰 2013），如果外部威脅斷定聯盟分歧會影響成員履約意願，就有可能發動攻擊將成員各個擊破（Crawford 2011; Hui 2005）。同盟關係惡劣也可能讓成員的其他盟邦對維持同盟關係的能力與意願感到不信任，於是該成員的其他同盟關係也可能惡化，美國在冷戰時期所擔憂的「骨牌效應」即為著名實例，美國不願輕易拋棄與任何一個盟邦的合作關係，因為其他盟邦可能對美國失去信心而尋求其他的安全保障。

既然公開同盟內部的不和諧可能會帶來負面效應。那麼當爭端公諸於眾便是有風險的行為，除非聯盟內部出現需要盟友共同關注與解決的矛盾，否則爭端不應該公開。因此有必要瞭解為何盟友會願意公開聯盟爭端。此外，如果公開爭端象徵聯盟內部的重大摩擦，那麼爭端對於聯盟未來關係的啓示，也是本文欲探究的重點。

本文為安全研究主要帶來的貢獻有三，首先，安全同盟相關理論主要關注聯盟的成立與破裂，較少關於聯盟管理的討論。然而盟友如何在同盟期間維繫關係，往往是聯盟合作能否長久的重要因素。聯盟內發生的爭執可對同盟關係帶來長遠影響。第二，學界對於同盟間摩擦的研究，大多將同盟關係的惡化歸因於特定時空下的國家利益轉變或是國內政情變化的結果，並指出關係惡化是導致同盟邁向破裂的導火線。<sup>1</sup> 這些研

---

<sup>1</sup> 例如義大利在一次大戰前與兩大同盟的關係的描述，見（Renzi 1968）。或是對北約會員國內部協調的討論，參見（Deni 2016; Lepgold 1998; Pressman 2008; Thies 2003）。

究較缺乏通則性，本文找出與聯盟直接相關的聯盟內部爭端，以量化方法分析爭端發生的結構性因素，顯示同盟爭端並非僅為國家利益相左或特定事件的結果。爭端的出現受內部與外部環境變動的影響，是成員基於身處的環境與自身安全需求所做的策略性行動。第三，本文進一步探究同盟爭端對同盟關係延續的影響，結果顯示盟友間公開爭端對同盟維繫有負面影響。這代表公開爭端是觀察同盟關係長遠發展的重要指標。本研究結果具有政策啓示的作用，盟友在管理同盟關係時，可觀察結構性因素的改變，衡量同盟關係可能出現的問題。而曾有公開爭端的同盟需要成員溝通合作解決歧見，方能確保長久的同盟關係。

## 貳、聯盟理論與聯盟管理

同盟出現歧異表示盟友對安全合作的現狀產生不滿，安全合作已經不能滿足簽訂盟約時盟友的期待。因此要瞭解同盟歧異，可追溯至國家選擇建立同盟的原因，當這些因素出現改變，成員對同盟的需求或期望開始改變，成員對現狀產生不滿，某一方公開提出質疑，便構成同盟爭端。

關於同盟的成立與盟友的選擇，學界已累積數十年的可靠研究，以國際體系的角度觀之，同盟行為是國家藉由共同應付外敵來確保生存的手段（Waltz 1979），盟約增強軍事打擊能力，有效嚇阻外敵，並實踐權力平衡（Mearsheimer 1990; Morgenthau and Thompson 1985; Walt 1987），聯盟亦有增強防衛能力、增加情報來源、加強與盟友的政治與經濟合作等等好處。安全利益通常是建立同盟的主要考量，但是盟約帶來的溢出效果將使同盟在各方面增加交流機會（Long and Leeds 2006）。同盟並非沒有風險，國家需提防盟友的背叛，而且盟約無可避免將增加承平時額外的防務或援助，還必須提

防遭盟友牽連（*entrapment*），陷入與自身安全利益無關的戰鬥中（Mandelbaum 1981; Snyder 1984），同盟決策是國家在增進自身安全與放棄政策自主性（*autonomy*）之間所做的兩擇（Altfeld 1984），越緊密的合作代表國家的自主性受到越多限制，因此在談判盟約時，國家也會仔細推敲條款，避免做出不必要的承諾（Kim 2011）。

但國家並不總是試圖制衡體系中最強的競爭者或集團，歷史上出現為數不少的扈從（*band-wagoning*）行爲，許多國家甚至拒絕加入任何同盟集團（Elman, Elman, and Schroeder 1995; Schroeder 1996）。華特（Walt 1985）提出以外部安全威脅爲基礎的結盟理論，若國家預期在未來將遭受外部威脅的挑戰，締結同盟就是較好的選擇，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理論對結盟對象的選擇做出更系統性的描述，國家選擇加入對自身較不構成威脅的陣營，因此國家將選擇能應付潛在威脅的盟友組合（Fordham and Poast 2014），因爲加入較強的一方可能是爲了遏止外部威脅不是扈從（Walt 1987）。由國家所定義的威脅不可避免帶有主觀判斷，有時難以斷定誰是最適合的盟友，因此，國家亦會考量到潛在盟友的名聲，以歷史經驗來判斷最佳的結盟對象（Crescenzi et al. 2012; LeVeck and Narang 2017）。

從理性選擇理論的角度，史奈德（Snyder 1997）提出結盟行爲的兩個重點，第一，國家必須在衆多結盟方案中選擇利益最大的一個，潛在盟友都必須認知到這些聯盟組合各自帶來的安全利益，以做出最適的結盟決策，第二，國際體系的權力分布影響了同盟組合的數量和結盟方式，每個國家所擁有的選擇會成爲談判盟約時用來討價還價的籌碼。鮑威爾（Powell 1999）運用形式理論（*formal theory*）得出類似的結論，他的模型指出結盟是考慮未來權力分布改變的結果，結盟決策取決

於外部威脅的侵略意圖與盟約的規模收益（return to scale）。締結盟約不代表能總合所有盟友的戰力，依據盟約內容還有執行方式，聯盟對所有締結方帶來的安全規模收益可能是遞增、遞減，或是維持不變，因此有時結盟的效益並不高，同盟是否能有效改變與敵對國家的軍事力量平衡，是結盟的關鍵，當規模收益讓一個國家在結盟後足夠對抗外部威脅，同盟就會產生並持續下去。

在盟約締結後，外部威脅受到聯盟抑制，聯盟是否能帶來穩定的規模收益來應付外部威脅，便成為聯盟維繫的重點。特別是規模收益下降時，盟友會喪失維繫同盟關係的誘因。規模收益下降的原因通常與盟約執行相關，可能是盟友的軍事能力改變，或是雙方對安全合作的內容看法分歧。規模收益的大小原本就受盟約本身規定的義務範圍所影響，除改變執行方式以維持規模收益外，盟友亦可重新討論盟約所規定的合作事項，從盟約涵蓋的範圍來改變同盟的安全利益。

因此，聯盟維繫的重點在於外部威脅的強弱以及成員間安全合作的執行效率。外部威脅的降低可能有兩種狀況：第一，威脅來源的軍事能力減弱；第二，威脅來源改變其結盟策略，改善與聯盟成員的雙邊關係。不過，這些改變可能會使成員直接放棄聯盟，或建立新的同盟關係以達成不同的目標，威脅降低不足以構成盟友由內部對聯盟發出質疑，因為盟友缺乏改善同盟的動機，除非成員感到被牽連的風險很高，否則成員一般不會主動要求調整或結束聯盟關係。換言之，當外部威脅軍事實力的提高以及同盟合作出現困難，盟友較容易對聯盟產生不滿，此時盟友便需要管理同盟關係，針對聯盟合作進行協商，或是澄清與重申對聯盟的承諾。

聯盟需要管理是由於維繫聯盟需要成本，盟友為維持聯盟的安全收益，不僅需要耗費人力物力，並且限制了其軍事部

署以及外交政策的靈活度。舉例來說，東歐國家加入北約雖然獲得強權的防禦承諾，但新會員國必須維持一定的國防支出，成為北約一份子限制了他們的財政支出計畫。莫若（Morrow 1991）與史奈德都將安全—自主性的兩難運用到聯盟管理的理論中。聯盟帶來的安全利益為彼此共享的集團財（club goods），盟友所承擔起的防務責任，其成果為所有同盟成員共享，既然收益無法明確分配，盟友總是希望用最少的付出，取得共享的安全利益，這意味著聯盟的安全規模收益下降時，盟友容易產生搭便車（freeride）的行為，試圖讓其他盟友維持聯盟的效益，聯盟管理即為針對安全合作進行協商，對未來安全合作的形式進行博奕，以最大化安全合作的效益，並最小化個別成員追逐私利的行為（Snyder 1997）。<sup>2</sup>

聯盟爭端的起因在於成員認為聯盟已不符合其需求，需要對目前的合作做出改變，或是提醒盟友重視及檢討某些影響共同安全利益的外交行動。爭端往往促使成員進行聯盟管理，對安全合作的方式進行博奕，協調彼此的安全利益，以期聯盟關係能穩定持續發展。盟友既然可預見開啓爭端會導致一連串的博奕，就會希望能在後續的博奕中取得最大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盟友一般而言會選擇用閉門會議來解決聯盟合作的問題，成員可由秘密的外交管道進行博奕，以免外界過份解讀爭端對聯盟關係的影響。因此盟友公開同盟爭端是一種不尋常的舉動。盟友之所以想公開爭端，可能與接下來盟友間針對該議題的討論有關。從博奕的角度而言，公開爭端可以作為一種信號（signal），幫助成員順利進行談判，增加談判成功的機率（Fearon 1997），這種信號有三種功能：第一，

---

<sup>2</sup> 史奈德列出數個影響博奕的變數，包括對聯盟的依賴、承諾的可信度、個別成員的國家利益等。

迫使其他成員對問題表態，避免成員迴避問題或置之不理；第二，展現成員面對與解決問題的決心，傳遞該成員對於爭端的立場；第三，政府可將爭端在適當時機下訴諸國內輿論，結合國內支持對盟友產生外交壓力，製造談判優勢，或是在國內支持下拒絕對其他成員讓步。<sup>3</sup>

公開爭端的用處在於利用國內輿情增加政府立場的公信力（credibility），此作用在民主國家中尤其明顯，由於輿論對政府存續有直接影響，民主國家能用公開信號展現決心與公信力。過去研究表明民主國家更容易釋放可靠的同盟承諾（Bennett 1997; Reed 1997），因為政府違背同盟承諾會影響國內支持，領導人必須承擔聽眾成本（audience cost）的負面後果。如果聯盟成員可以利用國內輿論對盟友釋出信號，那麼民主國家的領導人較可能公開聯盟內部的合作矛盾，以要求盟國面對並回應其疑慮。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歸納出以下重點。安全合作的效率受到聯盟內外的環境變遷所影響，當外部安全環境對聯盟不利，或是內部合作容易產生歧異的狀況下，成員便容易對聯盟效用產生疑慮，進而對目前的安全合作表達不滿或憂心。盟友將爭端公開的動機，除了純粹改善規模收益外，也可能是成員為進行內部博奕所做的策略性選擇，當資訊公開所產生的效益大過於產生的風險，盟友會選擇將內部矛盾公開，這種行動通常有兩個目的，其一為促進或加速內部博奕的過程，其二是增加與盟友談判的籌碼，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更好的安全利益。

---

<sup>3</sup> 如果政府無法掌握公開爭端的時機，則不必然能製造優勢，有時政府反而受到輿論壓力而無法自由做決策。英國與日本在談判第二次英日同盟時，英國政府對同盟的支持就受到國內輿論以及大英國協成員國的反對，使的英國政府左右為難。



以外部威脅的改變來說，敵國軍事力量的提升會使其對於動武更有信心，增加侵略的可能性，盟友就更需要強大的同盟來嚇阻侵略，因此外部威脅升高使盟友急於提高同盟的安全規模收益，威脅升高是相對的，若是外部威脅不變，而同盟的嚇阻能力下降，那麼對於潛在敵國的優勢仍舊是提高。同盟的防禦能力下降也會促使成員調整安全合作，創造更高的規模收益。由此可見，盟友對於安全規模收益的需求同時受到來自國際體系變動與聯盟內部和諧的影響。外部威脅的波動與安全合作的執行效率為一體兩面，任何一項改變都可能使聯盟的價值降低，若是成員感到安全收益不足以滿足其安全利益時，成員便有提出爭端的動機。爭端的提出並非為了拆散同盟，而是為了提醒盟友聯盟合作出現問題或對盟友的外交行動有疑慮，進而希望盟國共同解決。

盟友唯有在發現同盟無法再改善安全收益，而且其他同盟組合或是獨自奮戰能提供更多安全收益時，才會選擇離開同盟。實務上，盟友在承平時期主動要求退出同盟或撤除盟約的情形很少發生，因為盟約的存在代表雙方還有協商的可能，除非同盟關係惡化至全面軍事衝突，否則盟友大多選擇中止同盟合作，但條約效力仍持續存在。1985年紐西蘭政府拒絕美國核子動力艦布坎南號的訪問後，美紐關係急速惡化，美國隨即宣布將不履行對紐西蘭的合約義務，雖然紐西蘭從未真正退出聯盟，但美澳紐公約已名存實亡，直至今日美國尚未恢復對紐西蘭的安全承諾。

外部威脅低的時候，即便同盟合作效率開始降低，對安全利益影響並不明顯，事實上，在外部威脅變低的狀況下，成員對聯盟的執行效率較不敏感，因為聯盟仍然能夠提供足夠的安全利益，成員缺乏提出質疑或爭議的動機。相對的，若外部威脅不變而內部合作效益變低，或是外部威脅升高而聯盟無法提

出對應方案時，聯盟帶來的效益就會降低，而盟友容易對現有的聯盟合作產生不滿。表一列舉外部威脅與內部合作效率的變化，並簡述對於盟友衡量聯盟收益的影響。當盟友有試圖改善合作的意願，就可能提出聯盟爭端。

表一 安全合作效率與外部威脅對聯盟合作的影響

安全合作效率	外部威脅（武力侵略的意願）		
	降低	不變	升高
提高	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
不變	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	試圖改善合作
下降	維持現狀	試圖改善合作	試圖改善合作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如果外敵會趁盟友不和離間同盟或是發動攻擊，那麼當威脅越高，成員選擇秘密管道以避免敵國干擾的意願就越大。而外部威脅高的時候選擇靜默或是忍耐。但問題在於爭端公開是否會左右外敵的行動，倘若不回應升高的威脅，那麼外敵同樣可勸誘盟友背叛或是發動攻擊。在聯盟無法提供足夠的安全保障時，促使盟友積極改善聯盟合作會比敵國可能採取的行動來的重要，因此即便安全可能受到威脅，盟友仍有意願公開爭端。

不可忽略的是，對於外敵來說，公開爭端不見得代表聯盟即將分崩離析，爭端有時可展現聯盟的團結與解決內部矛盾的能力。盟友藉由公開討論展現解決問題的意願、回應升高的威脅、或是改善不如預期的安全合作。也就是說，盟友間的爭執可能恰恰展示出同盟自我管理與調適的能力。另外，較高的威脅本身就是刺激盟友對安全合作提出異議的契機，正因為必須進一步穩固同盟合作，成員更有意願對安全合作表示歧見。所以當聯盟內部安全合作出現嚴重問題時，成員仍然會有意願公

開提出爭端。當然，爭端的提出不代表爭端必然會獲得解決。公開聯盟爭端帶有一定風險，但是與風險比起來，盟友會認為提出爭端會是更好的選擇。

## 參、公開同盟爭端的成因以及影響

以下就上節的理論架構，以五個部分提出公開同盟爭端的相關假設。前四個部分論述聯盟爭端的結構性成因，首先探討國際體系改變對聯盟的影響，接著討論聯盟成內部變化帶來的影響，然後從博奕的角度探討民主國家提出公開爭端的傾向，第四部份提出其他可能的解釋。第五部分檢視聯盟爭端對聯盟關係的長遠影響，以期對聯盟存續做出理論貢獻。

### 一、外部威脅

在安全領域中，國家的安全利益與國防威脅常因國際政治變化而改變。新興強權崛起、新軍事聯盟成立、或是各國的軍事科技發展，為盟國帶來新的潛在威脅，也對同盟帶來挑戰。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聯盟常是為了抵抗外部威脅而成立，條約卻很少直接指明外部威脅的來源，歷史上，在條約中明述敵國大部分是針對防範德國與日本在二戰後再度侵略，絕大部分安全同盟針對的外部威脅，都不僅限於特定對象。因此盟友所感受到的外部威脅，是國際體系中的所有潛在敵國。這些對象可能會依照國際體系的變動而有所不同。對於成員來說，聯盟除了幫助對抗已知的威脅，還要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動，嚇阻潛在敵國。聯盟能不能在外部威脅改變的狀態下提供奧援，便是盟友衡量聯盟收益的依據。

外部威脅的升高會使盟友提出公開爭端，首先，在威脅升高而內部合作不變的狀況下，聯盟提供的安全收益不合時宜，必須由盟友討論應對措施，由於聯盟成立之初無法預見安

全環境變動的方向，因此是否需要改變聯盟合作、或是該如何改變，都可能是盟友爭執的重點。第二，公開爭端可作為展現決心的信號，爭端的提出是爲了讓盟友面對並解決問題，穩固聯盟關係。因此面對越高的威脅，不僅聯盟內部容易對安全合作產生歧異，成員也有更意願藉由公開爭端展示解決問題的決心。

**假設 1：外部威脅升高時盟友容易出現公開爭端。**

## 二、盟友間權力關係

外部威脅的升高並非盟友產生不和的唯一原因，運作良好的聯盟可以共同找出應付外部威脅的方法，當聯盟內部盟友間關係產生變化而無法很好應付外部威脅時，盟友間就容易出現爭端，這通常可歸因於兩個因素：成員配合的能力不足或是意願不足。盟友的軍事能力是在結盟時主要的考量（Horowitz, Poast, and Stam 2017），若盟友的軍事力量走向下坡，就無法達到結盟時盟友們的安全需求。內部權力的變化直接影響到安全合作，莫若（Morrow 1991; 1994）以典型的義務分配為例，若盟友間實力相近，代表他們都有能力承擔責任，它們相對擁有較大的政策自主性，不易爲爭取政策自主性而與盟友起爭端，過去的研究也證實，實力對稱的聯盟通常有較穩定的安全合作（Bearce, Flanagan, and Floros 2006; Bueno De Mesquita 1990; Thies 1987）。相較起來，權力差距大的不對稱聯盟，較容易發生搭便車的行爲，較強的成員會試圖主導安全合作的分配，並且擔任監督與執行的角色，較弱的成員在將防務責任由較強的一方承擔之餘，會希望盡力爭取政策自主性，因此較容易與盟友就合作內容起爭執。因此實力不對稱的盟友，在結盟後的交往以及合作中，有較大風險爲爭取自主性而出現聯盟管理的摩擦。

假設 2：盟友內部權力平衡越不對稱，出現公開爭端的機會越高。

### 三、民主國家與同盟合作

公開聯盟爭端可作為與盟友博奕的策略，迫使盟友面對問題，或是展現自己解決爭端的決心。一般而言，國家會傾向利用公開發聲（voice），而不是私下談判，這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在聯盟間博奕中，民主政府可以透過公開發聲來產生縛手效應（tying hand effect），政府一旦公開宣示政策目標，就難以在談判中多加退讓，如果政府最後達成的目標與當初宣示的差距太大，國內輿情會要求政府擔起政治責任，甚至否決不利於該國的談判結果（Fuhrmann and Sechser 2014; Slantchev 2005）。第二，民主政府可能迫於國內壓力必須向盟國要求協商，將爭端公開具有回應與安撫國內群眾的作用。由於對於民主國家而言，國內輿論更容易用來傳遞可信賴的訊號（credible commitment），亦可以在談判時施壓對手讓步（Fearon 1997; Putnam 1988）。民主國家會更傾向在適當時機將爭端公開以獲取群眾支持，在沒有盟國要脅退出同盟的前提下，<sup>4</sup> 公開爭端對民主國家來說是一種有效談判策略。如果盟友都是民主國家，利用聽眾成本來傳遞訊號的動機較高，受制於國內壓力而必須公開向盟友提出要求的機會也增加。因此民主國家組成的聯盟較容易發生公開聯盟爭端。

---

<sup>4</sup> 這個前提在聯盟爭端的情況可以成立。聯盟不和並不代表聯盟有立即破裂的風險。聯盟成員理論上會先試圖解決爭端，利用退出同盟作為要脅是一個風險非常大的威逼手段，因為成員不能確定盟友維繫同盟意願，這種要求本身就可能改變盟友維繫同盟的意願，理論上，這種要脅對於聯盟內博奕和同盟關係具負面效果。

**假設 3：當聯盟成員都是民主國家時，較容易出現公開爭端。**

#### 四、其他解釋

條約作為規範盟友行為的基本文件，對於合作有相當大的影響。懷茲曼（Weitsman 2004）與施若德（Knorr 1976, chap. 5）都曾指出，聯盟條約是管理雙邊關係的一種方式，國家可透過同盟降低外交或軍事上的矛盾（Lim and Cooper 2015）。結盟所建立的溝通管道增進了雙邊溝通的機會，盟友可藉由聯盟所規範的規則商討安全合作，無論這些規範是訴諸條文的協定或是無形的默契，聯盟制度化代表盟友存在緊密的合作關係，能保持盟友良好的溝通管道，因此擁有制度化規範的聯盟應該能比較有效調解盟友間的矛盾，減少爭端發生的可能。此外，若聯盟設立之初，就訂立解決紛爭的方式，那盟友應該可以遵循條約經由外交管道討論解決紛爭，不需要公開討論彼此的爭端。

不過，上文各項假設已表明，爭端的起因在於安全合作已經不合時宜，盟約符合訂約時的成員國利益，但經過聯盟內外環境的改變後，盟約是否能鼓勵成員秘密解決雙方歧見存在很大疑問。當客觀環境改變，盟友安全利益也改變的時候，盟約條款的約束力可能相當有限。

#### 五、公開爭端與聯盟存續

當盟友間出現嫌隙，或質疑聯盟的效用，是否會影響聯盟的命運？之所以要探討聯盟爭端的產生，是因為爭端的出現可能對聯盟關係造成長遠的影響。觀察家往往把聯盟內的矛盾視為聯盟解散的前兆，因為爭端很可能代表著聯盟內部存在重大且難以解決的衝突。盟友因歧見而發生爭執，可能就此埋下

不和的種子，導致日後聯盟合作出現困難，或是單方面中止部分聯盟合作。盟友也可能在維持現有的同盟關係下尋求新的結盟機會，取代原本聯盟的功能，為離開聯盟後的安全利益做準備。爭端也削弱盟友彼此的信任，讓盟友的忠誠蒙上陰影，使成員對盟友的可信賴度產生疑慮，盟友間互相猜忌則可能發展為更深的裂痕。若某一方認為爭端無法解決，進而選擇退出同盟或拒絕履行盟約，同盟關係就此破裂。

果真如此，爭端的出現便可作為一種先兆，幫助吾人預測安全合作提前破裂。觀察盟友間爭端的出現、持續、解決過程、以及是否有解決的可能，這些因素常是國關學者評估聯盟關係是否穩固的重點，如果公開爭端的出現可以讓我們更瞭解聯盟關係的未來走向，那麼我們更能推測盟友爭執的諸多問題所帶來的長期影響，比如沖繩美軍基地的爭議，或是北約防務分擔的問題等等。

**假設 4：公開聯盟爭端對於聯盟持續有不利的影響。**

## 肆、研究方法與模型

本文採用量化研究分析上述假設，本研究使用的資料庫以 Newgene 軟體（Bennett, Poast, and Stam 2017）自數個國關學界常見資料庫取得相關變數：聯盟的資訊取自 Alliance Treaty and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ATOP）（Leeds et al. 2002）。國家實力的資料由 Correlate of War（COW）取得（Singer, Bremer, and Stuckey 1972）、政體資料取自 PolityIV（Marshall, Jaggers, and Gurr 2002）。資料庫橫跨時間為 1945～2007 年，範圍為冷戰間成立的所有雙邊安全同盟。以二戰後為資料範圍主要考量兩個限制，第一，冷戰後所成立的同盟多為冷戰期間聯盟的延續，而且許多目前仍在運作的安全同盟皆成立於冷戰時期，瞭解二戰後同盟行為，對當前與未來各國同盟關係的理解與

評估較具啓示作用。第二為依變項編碼工作，蒐集二戰前的聯盟爭端資料相對困難，作者自行編碼的範圍橫跨半個世紀的雙邊同盟，已能構建可靠的數據庫進行分析。二戰後由於美蘇強權的競爭，有許多公開聯盟爭端值得討論，冷戰後的單極世界也使的既存的聯盟存續受到挑戰，因此，本資料庫範圍適合測試本文假設。

以 Newgene 製作資料庫，Newgene 收集的 COW 資料至 2007 年為止。由於 ATOP 的資訊僅至 2003 年，作者補足 26 個 2003 年後仍續存的聯盟的相關資訊，延長資料至 2007 年。資料庫總共包含 187 個雙邊條約聯盟，<sup>5</sup> 3754 個觀察值，觀察單位為聯盟一年，為跨國時間序列（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數據。

將觀察範圍侷限在雙邊條約是由於此研究設計較適合檢視本文假設，在多邊聯盟中，成員對同盟提出爭端時，對象通常並非所有會員國，也不需要每個成員參與回應，多邊聯盟讓爭端的定義和影響複雜化，成員可能針對另一成員或某個事件（如增添新成員）有異議，但並不代表整個聯盟成員間都出現矛盾，爭端是否影響到整個多邊聯盟的運作也有疑問，只有在聯盟中占有領導地位、承擔大部分安全責任的主要成員，能夠掀起足以癱瘓聯盟運作的爭端，在研究設計上會遇到兩個主要困難，第一，哪些是主要成員有賴研究者主觀判定。第二，即使能以對安全利益的貢獻來篩選影響力較大的成員，也很難斷定這些成員所參與的爭端是否影響到聯盟合作關係。相對來說，爭端對雙邊關係有立即影響，因此檢視雙邊條約能更清楚展現公開爭端對聯盟關係或聯盟命運的影響。

---

<sup>5</sup> 因成員退出而變成雙邊聯盟者不計入本資料庫，比如 1985 年以後美澳紐聯盟實質上成為雙邊聯盟。由於這樣的關係與一開始就是雙邊同盟的聯盟不同，因此不納入考量。



## 一、公開聯盟爭端

假設 1~3 的依變項為公開聯盟爭端，由作者自行編碼，為原創資料，涵蓋範圍為 1945~2007 年 187 個聯盟條約，主要參考資料來源為二手史料，包括 Keesings World News Archive, LexisNexis databases 以及討論個別雙邊聯盟關係的專書或期刊文章。聯盟間爭端的定義為：任一方對聯盟相關的安全合作明確表示不滿、質疑執行的效率、表達疑慮、或是宣稱成員的外交政策對聯盟合作有害。編碼的重點為雙方爭執需與聯盟合作直接相關，必須明確表示對目前聯盟安全合作表示擔憂或抗議，與聯盟義務無關的政治、外交、領土、貿易衝突均排除在外。事件若持續有新發展，或是成員繼續提出公開質疑，則仍定義為該年出現爭端。此變項為二元變數，在資料範圍內存在 67 個公開聯盟爭端，爭端的詳細內容、參考文獻可參閱線上附錄。

本文使用勝算對數模型 (logit) 檢視公開爭端的發生，此模型適用於檢視二元變數，由於資料庫為跨國時間序列資料，採用發生爭端前的持續時間 (t) 以及其二次方與三次方，來控制時間序列資料可能存在的自相關性 (Carter and Signorino 2010)，並且以聯盟為集群單位 (cluster) 避免異質變異性 (heteroskedasticity) 對模型的影響。此處回報 5 個模型，模型 1~3 包括三個主要變數與控制項，模型 4 包含所有變數，模型 1~4 回報共變異數矩陣校正後的健全標準誤。模型 5 使用隨機效應 (random effects) 控制縱橫資料的影響 (Beck and Katz 2007)。<sup>6</sup>

---

<sup>6</sup> 近期發現指出，比固定效應 (fixed effects) 法，隨機效应在控制縱橫資料誤差上是較理想的作法，請參考 (Bell and Jones 2015; Clark and Linzer 2015)。

自變項有三，首先是衡量聯盟所面對的外部威脅。由於威脅並不固定也不明確，必須瞭解聯盟成員在國際系統中有多少潛在外敵，本文參考 Leeds 與 Savun（2007）構建威脅環境（threat environment）的方法，針對每個成員找出對其較不友善的國家，計算個別成員自身面臨的威脅。<sup>7</sup> 與他們不同的地方在於，作者比較盟友各自面臨的威脅環境，取較大的數值作為同盟「共同面對」的威脅，再將每一年的威脅程度與聯盟成立當年做比較，若威脅值較聯盟成立時增加，則為外部威脅增加。另外，持續的領土爭端代表國家隨時面臨來自敵國的挑戰，領土為國家感受威脅最顯著的議題，成員聯盟與其他國家有領土上的宿敵關係，表示該聯盟長期處於軍事威脅，且不時會受到敵國的軍事挑戰，隨著領土問題懸而未決，軍事競爭也不斷升溫，這裡使用 Gibler（2014, chap. 6）的關於領土宿敵的資料（territorial rivalry）。<sup>8</sup> 本變數為二元變數，0 代表威脅不

---

<sup>7</sup> 這裡判別不友善的國家是利用 Signorino 與 Ritter（1999）的友好程度指標（S-score）。該指標的計算基於個別國家在聯合國的投票行為、派駐外交使節、聯盟、貿易等等關係，以此捕捉國家間的外交行動相似的程度。計算的過程為，針對某一國的非盟友，找出 s-score 在整體中位數以下的所有國家（此處為 .776224），這些是較不友善的國家，再從中取出國際政治上較為重要或容易發生交往的國家，這裡使用的是 Maoz and Russett（1993）對 political relevant dyad 的定義，將這些較不友好國家的國家實力數值加總，即可推測一國面臨的威脅環境。雖然學界亦常用 Tau-b（Bueno de Mesquita 1975）衡量雙邊友好程度，但這個量尺並不適合本研究，Tau-b 的計算僅基於某國與他國的聯盟關係，以此推斷該國面臨的在國際體系中的盟友與非盟友（威脅），以此量尺衡量威脅環境可能與模型中的變數具有高相似度，而且有因果關係倒置的疑慮。

<sup>8</sup> 該資料是基於戰略性宿敵（strategic rivalry, Thompson 2001）的資料。雖然學界有其他關於宿敵（enduring rivalry）的資料，使用 Thompson 的資料的優點在於他以歷史文獻定義宿敵關係而非基於反覆的軍事衝突（Colaresi, Rasler, and Thompson 2008; Diehl and Goertz 2001; Dreyer 2010;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Thies 2011）。Thompson 區分立場（positional）與空間（spatial）宿敵，Gibler 進一步以後者構建領土衝突的宿敵資料，對於理解國家因領土衝突所受到的威脅很有幫助。

變或減少，1 為威脅增加。

第二個自變項為聯盟間權力平衡，此變數利用 COW 的國家實力指數（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 CINC），為一國在該年於國際體系內國力的比例。以聯盟中較弱的國家對比較強的國家衡量國家實力差距，數值範圍為 0 到 1，數值越大代表雙方權力平衡越接近，反之，數值越小代表不對稱性越大。此變項數值延遲一年，因為雙方實力差距出現變化之後，要反映在安全合作的矛盾上需要時間，而且盟友進行合作時，通常會參考過去合作的狀況來決定是否有問題需解決，因此爭端的提出可能比權力對比變化的出現稍晚。

第三個自變項衡量盟國民主化程度對公開爭端的影響，民主國家的定義採用 PolityIV 的民主化指標，該指標綜合各項制度上與法律上合乎當代民主自由精神的變數，從 -10 至 10 共 21 個數值，越高者民主化程度越高。雙邊皆為民主國家的定義為兩者民主化指數皆大於或等於 7。此數值代表開放並且穩定的民主社會，是學界廣為使用的標準。本文未試圖預測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盟友行爲，除資料的形式不適合做指向性的行爲預測外，只有一方為民主國家在理論的適用性也有疑問。非民主國家可以理解民主國家解決爭端的決心與可接受的選項，但是仍舊有迴避問題或拒絕讓步的餘地，相對的，一對民主國家在面對來自國外與國內的輿論壓力時，較有必要面對並解決爭端，以免對政府形象或是領導人政治生涯造成負面影響，因此雙邊民主國家應最能突顯政體對聯盟關係的影響。

主要的控制變數為能夠影響安全合作的聯盟條文，均由 ATOP 資料庫取得，作者自行補足 2003 年後的資訊。主要檢視以下數個條款對出現公開爭端的影響：成立相關組織的條款、互不侵犯條款、爭端解決相關條款、共同防禦條款、共同進攻條款、以及提供軍事援助的條款。成立組織增加盟友接觸

交流的機會，理論上能降低產生爭端的機會。另外加上聯盟是否成立於戰爭期間、盟友地理上的相近關係。最後的控制變數為任一盟友與第三方發生國際危機，這部分使用國際危機行為資料庫（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 ICB）的數據（Brecher and Wilkenfeld 1997）。<sup>9</sup> 表二為統計結果。

表二 結構性變因與盟友公開爭端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假設1	假設2	假設3	完整	隨機效應
外部威脅升高	1.528***			1.147**	1.142**
	(0.35)			(0.41)	(0.41)
盟友間權力對比(t-1)		-2.302**		-1.692*	-1.700*
		(0.78)		(0.83)	(0.84)
民主國家同盟			0.964**	0.888**	0.880**
			(0.32)	(0.32)	(0.33)
組織建立條款	0.338*	0.236	0.208	0.265+	0.280
	(0.15)	(0.17)	(0.16)	(0.16)	(0.19)
互不侵犯條款	0.674*	0.928*	0.733*	1.091***	1.091***
	(0.32)	(0.38)	(0.29)	(0.32)	(0.33)
紛爭解決條款	0.350	0.394	0.517	0.611*	0.619*
	(0.31)	(0.28)	(0.37)	(0.29)	(0.31)
共同防禦條款	0.826*	0.762*	0.634	0.973*	0.975*
	(0.35)	(0.38)	(0.41)	(0.38)	(0.39)

<sup>9</sup> 依據 ICB 資料庫對國際危機的定義，國際危機是由暴力與非暴力的政治、經濟、或軍事威脅所引發，參與方必須在急迫的時間內回應，與主要變數「盟友間爭端」似有共通之處，但聯盟爭端的定義為與聯盟合作有關的爭端，與國際危機仍有差距。兩變數相較下並未高度重疊，兩者的相關係數為 0.0699。卡方檢定 (Chi-square) 的值为 18.3449,  $p < .001$ 。

共同進攻條款	0.337	0.150	0.343	0.382	0.387
	(0.44)	(0.45)	(0.43)	(0.43)	(0.45)
軍事援助條款	0.436**	0.446**	0.480**	0.520***	0.521**
	(0.16)	(0.17)	(0.17)	(0.16)	(0.16)
聯盟成立於戰爭期	-0.860	-0.961 <sup>+</sup>	-0.920	-0.730	-0.745
	(0.91)	(0.57)	(0.73)	(0.73)	(0.73)
領土鄰接	-0.123	0.230	0.196	0.112	0.131
	(0.28)	(0.34)	(0.30)	(0.34)	(0.36)
盟友間發生國際危機	1.618**	2.132***	1.549**	2.105***	2.129***
	(0.52)	(0.56)	(0.54)	(0.55)	(0.56)
常數	-5.100***	-3.647***	-4.430***	-5.298***	-5.388***
	(0.54)	(0.60)	(0.59)	(0.66)	(0.77)
觀察值數量	3568	3387	3568	3387	3387
Pseudo R <sup>2</sup>	0.153	0.152	0.126	0.189	

說明：1.括號內為健全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sup>10</sup>

2.表格省略 t,t2,t3 的統計結果。

3.\*\*\*p<.001; \*\*p<.01; \*p<.05; +p<.10。

資料來源：(Bennett, Poast, and Stam 2017; Brecher and Wilkenfeld 1997; Gilber 2014; Leeds et al. 2002; Singer, Bremer, and Stuckey 1972)

## 二、聯盟爭端與聯盟關係之持續

本節使用存活分析檢視假設 4，以公開聯盟爭端作為主要自變項，研析出現公開爭端後，聯盟是否會穩定持續。模型以

<sup>10</sup> 為檢視異方差性，使用異方差健全標準誤（vce），模型結果並未改變。檢視各項變數的膨脹係數（VIF）亦未發現多重共線性問題。以上分析結果請參見線上附錄。

「天」為單位計算聯盟長度，每年最後一天為聯盟總長度截止日，至聯盟終止為止，如聯盟在 2007 年後仍存在則計至該年最後一日，為右設限資料（right-censored）。存活風險分析使用 Cox 比例風險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此模型為半母數模型（semi-parametric model），不需針對存活時間分布有既定假設，較適合分析本文問題（Box-Steffensmeier and Jones 2004）。<sup>11</sup> 依變項為盟友做出違反盟約的行為，以 ATOP 定義為準，若盟友在盟約所規定的到期日之前宣布退出同盟，或是未履行同盟義務，即為違反盟約。<sup>12</sup>

模型加入可能影響聯盟存續的控制變項。包括聯盟是否為主要國家（major power）與次要國家組成，此處採用 COW 的資料。民主國家同盟與上述相同。任一成員與第三方締結同盟的資訊取自 Leeds 與 Savun（2007）的資料庫。盟友雙方發生國際危機以及任一盟友與第三方發生國際危機兩個變數取自 ICB，這兩個變數的意義不同，前者代表聯盟內出現爭執，後者代表聯盟遭受外來挑戰。成員捲入國際衝突則取自跨國軍事衝突（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MID）（Palmer et al. 2015），只納入致死衝突的原因在於這些衝突會對安全情勢造成顯著影響。最後加入數個 ATOP 的義務條款，包括軍事援助、續約規定條款、互不侵犯條款、中立條款、紛爭解決條款。最後加入聯盟是否為戰時成立，以及聯盟義務是否不對稱。此處回報三個模型，模型 1 納入所有變數；模型 2 只包

---

<sup>11</sup> 使用存活分析可能出時間相依共變數（time-varying covariate）的問題，但是本文使用的自變項不與時間呈現規律性的變動關係，而只是隨著年度不同呈現不同的數值。此外，Stata 的 `stcox` 能協處理時間相依共變數的問題，見（Cleves, Gould, and Marchenko 2016, chap. 10）。

<sup>12</sup> 違約並非聯盟唯一的結束方式，聯盟可能發生爭端，在若干年後解散，但並未違約。存活風險分析能將此情形納入風險計算的考量。

含結構性變因；模型 3 僅包括盟約訂立的義務。結果總結於表三。

表三 公開聯盟爭端對於聯盟持續的存活分析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完整	結構性因素	條約內容
盟友公開爭端	2.004***	1.695**	2.058***
	(0.56)	(0.52)	(0.49)
聯盟內部實力不平衡	-1.201**	-0.794*	
(主要國家 vs 次要國家)	(0.45)	(0.37)	
民主國家同盟	-1.407	-1.130	
	(0.90)	(0.72)	
某成員與第三方締結同盟	0.228	0.374	
	(0.33)	(0.32)	
盟友間發生國際危機	2.105***	1.562***	
	(0.41)	(0.45)	
任一盟友與第三方發生國際危機	1.504***	1.336***	
	(0.45)	(0.38)	
任一盟友與第三方發生致命的跨國軍事爭端	1.147*	0.810*	
	(0.45)	(0.35)	
軍事援助條款	0.429*		0.188
	(0.20)		(0.21)
續約相關條款	-0.363+		-0.163
	(0.20)		(0.16)
互不侵犯條款	-0.366		-0.376
	(0.43)		(0.50)
中立條款	-0.606		-0.561
	(1.40)		(1.19)

紛爭解決條款	0.847+		0.462
	(0.48)		(0.47)
聯盟成立於戰爭期間	-0.008		-0.444
	(1.04)		(1.06)
聯盟義務不對稱	-0.426		-0.485
	(0.59)		(0.52)
觀察值數量	2283	2447	3552
Wald $\chi^2$	87.89	56.77	25.54
Log pseudo likelihood	-113.048	-155.932	-206.449

說明：1.本表回報迴歸係數（coefficient）而非風險比（hazard ratio）。

2. \*\*\* $p < .001$ ; \*\* $p < .01$ ; \* $p < .05$ ; +  $p < .10$ 。

資料來源：(Bennett, Poast, and Stam 2017; Brecher and Wilkenfeld 1997; Leeds et al. 2002; Leeds and Savun 2007; Palmer, Vito, and Michael 2015)

## 伍、結果與討論

### 一、公開聯盟爭端的產生

表二顯示，外部威脅的增加會使盟友更容易出現公開爭端，在 95% 的信心水準下，迴歸係數為正值。表四計算外部威脅與民主同盟的預測機率，盟友實力對比由於是連續變數，將以圖示表示於圖一。以外部威脅而言，在其他條件不變的狀況下，外部威脅上升會使爭端出現的機率從 .8% 增加至 2.4%，約增加兩倍。這顯示外部威脅的變動容易造成內部對於安全合作的矛盾。假設 1 得到證實。



表四 自變項邊際效果\*

	邊際效果	成長百分比
外部威脅（不變或減少→增加）	.0156	194.4%
民主同盟（非民主→民主）	.0178	1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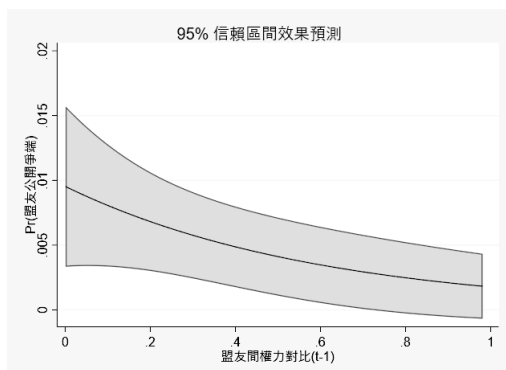
\*註：邊際效果使用 Stata15 的 margin 指令。以表二的模型 4 為基礎，除自變項固定於某數值外，其餘變項使用實際數據。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假設 2 也在表二中獲得證實。盟友間權力對比越均勢，則越不容易出現公開爭端，此結果與假設符合，也呼應過去相關研究。圖一顯示實力對比擴大時，公開爭端出現的機率越高。當盟友實力對比從 25 個百分位上升至 75 個百分位，也就是圖一的 X 軸向右，而盟友間實力趨於對等時，出現公開聯盟爭端的機率從 2.2% 下降到 1.1%。以 COW 的各國軍事支出取代將該變項，亦得到相同結果，且統計結果仍為顯著。<sup>13</sup>

<sup>13</sup> 軍事支出是衡量國防安全實力最直接的統計方式，因為軍費總額顯示國家對安全議題投注的資源。軍事支出為 COW 衡量 CINC 指數的六個指標之一，使用 COW 的資料是由於該資料較為完整，僅有 116 個缺漏資料（CINC 為六個指標的綜合指數，故無缺漏資料）。以廣為使用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中心（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的統計資料為例，該資料庫在 1980 年代以前有許多遺缺，導致將近 2000 個觀察值無資料可循。若以世界銀行提供的國內生產總額，或人均生產總額作為衡量標準，則有大約 1200 個缺漏值。因此使用 COW 的資料更為合適。相關模型請參見線上附錄。

圖一 盟友間實力對比對公開同盟爭端的邊際效果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回到表四，民主國家同盟確實較容易發生公開聯盟爭端，跟非民主國家同盟（或只有一方為民主國家）比起來，發生爭端的機率從 1.4% 增加到 3.2%，增加 1.2 倍。假設 3 亦獲得證實。

表二中有數個控制項的結果值得探討，首先，聯盟制度化化的影響不具統計意義，該變數僅在模型 1 達到統計顯著，顯見聯盟成立之後，盟約所訂立的制度化交流應該與爭端的出現無關，聯盟爭端的出現應與成立後所發生的內部與外部變動較為相關。一般常見的聯盟義務，比如防禦或進攻義務對爭端產生並沒有影響，但是互不侵犯條約會增加發生爭端的機會，此結果表示互不侵犯條約是一種在有限範圍內試圖管理盟友間衝突的制度，<sup>14</sup> 這種關係並非建立在維護共同利益的立場，因此相

<sup>14</sup> 有關互不侵犯條款的制度化作用，參考（Bearce, Flanagan, and Floros 2006; Gibler 1996; Long, Nordstrom, and Baek 2007; Lupu and Poast 2016; Weitsman 2004）。

對而言較為脆弱，聯盟內部的聚合力較差，較容易起爭端。<sup>15</sup> 軍事援助條款由於容易觸動義務分擔的問題，也容易引起爭端。最後，盟友間如果發生國際危機，則聯盟關係無可避免的會受到影響，這表示危機的爆發會使雙邊關係的各個面向發生問題。危機也許原本與聯盟關係無關，但危機出現後，盟友會更容易針對聯盟合作發生爭吵。將此變數移除並不影響統計結果。

## 二、公開爭端對聯盟持續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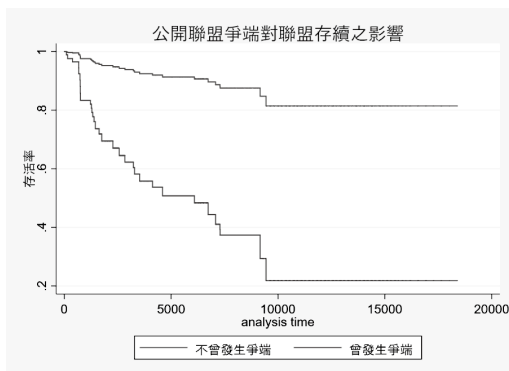
表四顯示公開聯盟爭端對聯盟持續的負面影響相當明確，所有模型的迴歸係數均為正值，而且在所有模型中都達到統計顯著標準（ $p < .01$ ），此變項也符合 COX 模型的比例風險假設。這代表在同一時間點時，與沒有發生爭端的聯盟相較，曾有爭端的聯盟違約的風險較高。由圖二的 Kaplan-Meier 曲線可看出，曾發生公開爭端的盟友，在十年內的存活率明顯地下降，也就是盟友違背盟約的可能性大幅升高。不論是以結構性因素控制（模型 2），或是以盟約內容來做控制（模型 3），結果都相當一致。以聯盟持續天數的自然對數作為依變項，結果也相同，使用 Weibull 存活分析模型（有母數模型）也得到相同結果。此結果顯示，公開聯盟爭端對聯盟的延續帶來不利的影響，同盟爭端的確容易造成聯盟提早結束，若要瞭解聯盟未來的發展，應多加留意盟友是否曾發生過公開爭端。

---

<sup>15</sup> 注意此處的結果與（Mattes and Vonnahme 2010）的發現不違背。該文指出真正的互不侵犯條約有助於控制盟友間的軍事衝突，本文則指出，即使盟友沒有軍事衝突，相較於其他種類聯盟，互不侵犯同盟更容易出現盟友間的公開爭端。

在其他變數方面，亦有幾個值得討論的結果。<sup>16</sup> 當盟友間發生國際危機、任一盟友涉入國際危機、或是涉入與第三方的軍事衝突時，對聯盟持續時間均有負面影響，這代表聯盟成立後發生的衝突事件，對聯盟關係的持續有負面作用。體系中的大國與小國結成的同盟一般而言能持續比較長的時間。而除了軍事援助與紛爭解決條款外，聯盟各項條約義務對於聯盟持續都沒有幫助。

圖二 公開爭端對雙邊軍事同盟延續的 Kaplan-Meier 存活曲線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 肆、案例討論

上述統計分析展現的結果，可做為學者研究同盟關係波動與維繫的依據，本文的發現亦對歷史案例有所啟示。以下數個案例說明本文自變數的作用。首先，冷戰期間美國與土耳其雖為親密盟友，但雙方針對賽普勒斯問題一直沒有共識，隨著希

<sup>16</sup> Gartzke 與 Gleditsch (2004) 就民主國家的特質提出相反的論點，但是他們著重在衝突發生時民主國家是否會介入保護盟邦，而不是整體聯盟持續期間的長短。

臘裔與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的政治爭端不斷擴大，土耳其將保護土裔居民視為其安全利益的一部份，而美國一向拒絕支持土耳其介入賽普勒斯情勢。1963年12月，一場地區性的族群衝突引發賽普勒斯聯合政府垮台。<sup>17</sup> 土耳其認為土裔賽人受到排擠與威脅，欲加強介入。由於土耳其認為賽普勒斯問題攸關其核心安全利益，欲引用1959年與美國簽訂的盟約尋求美國的軍事援助，但遭到美國拒絕，美國認為賽普勒斯議題不在盟約範圍之內，雙方為合約適用範圍此引發爭執。值得注意的是，1959年的條約為美國單方面承諾在土耳其遭受威脅時提供援助，土耳其認為賽普勒斯危機對自身領土造成威脅，需要盟邦提供軍事裝備以防範希臘動武，而美國瞭解答應土耳其的請求會將美國間接牽連進賽島糾紛中，支持土耳其勢必引來希臘的抗議，因為希臘在此糾紛中一直支持希臘裔賽普勒斯人，美國不願涉入賽普勒斯問題。對土耳其來說，賽普勒斯衝突擴大代表它與希臘的情勢日趨緊張，可能演變為兩國的軍事衝突，土耳其希望美國基於盟友身份協助對抗來自鄰國的安全威脅，美國的拒絕令土耳其相當不滿。同盟的緊張關係一直持續到1974年賽普勒斯內戰爆發，美國為制止土耳其出兵賽島而對土實施武器禁運，土耳其則擱置了所有與美國的安全合作作為報復，並向其他國家尋求軍事裝備（Durmaz 2014）。

另以葉門王國（Mutawakkilite Kingdom of Yemen）與阿拉伯聯合共和國（United Arab Republic）的聯盟為例。1958年埃及、敘利亞、與約旦推動阿拉伯世界組成聯邦共和國，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主張的泛阿拉伯主義獲得許多阿拉伯國家支持，葉門王國於1958年3月加入，而伊拉克於同年7月加入。但是UAR與其他阿拉伯兄弟邦的合作一直都

---

<sup>17</sup> 有關賽普勒斯衝突的歷史，參見（Dodd 2010; Joseph 1997; Michael 2012）等著作。

不順利，內部也屢見不和。埃及挾其強勢的軍事與經濟實力領導同盟，各國都對納瑟介入盟邦國內事務的獨斷手腕頗有微詞。葉門伊瑪目 Ahmed 選擇與 UAR 結盟，是爲了在與英國對抗中取得阿拉伯國家的支持（尤其是埃及），並且減緩納瑟對其政權的批評，但是埃及的強大始終令 Ahmed 感到不安，擔心埃及的支持隨時可能變卦。1961 年 9 月，敘利亞因不滿埃及的控制而發生政變並退出 UAR，缺少敘利亞的支持，UAR 軍事實力驟減，不能再提供葉門足夠的安全利益。伊瑪目隨即宣稱 UAR 是違反伊斯蘭教義的聯盟，當年 12 月便退出同盟（Walt 1987）。隔年納瑟轉而支持葉門革命，開啓爲期 8 年的北葉門內戰。

最後，民主國家主動公開聯盟爭端的例子並不少見，例如日本政府在 1995 年就曾公開要求美國協商沖繩普天間基地的遷移問題。隨著沖繩在戰後的經濟發展以及駐沖繩美軍與當地居民紛爭不斷發生，沖繩當地要求美軍基地遷移的聲浪不斷高漲，日本政府公開呼籲美軍協商此問題，目的就在於迫使美國開啓協商，同時回應國內的政治壓力。美日隨後成立了一個特別行動委員會討論基地搬遷問題。雖然委員會在隔年提出搬遷方案，但是遭受當地居民反對，搬遷一延再延，時至今日，普天間基地的搬遷仍未完全解決。國家領導人也試圖利用公開爭端的方法爭取協商談判的優勢，2005 年烏茲別克以美國干涉內政爲由拒絕美軍使用該國的機場，美國隨後與鄰國吉爾吉斯斯坦重新談判 2001 年簽訂的基地租借條款，由於美軍在中亞沒有其他基地可選擇，吉國總統在電視訪談中公開發布美軍租借基地的金額將大幅調漲，隨後並宣稱如不能在期限內達成協議，吉國將撤銷基地租借條款（Osmonov 2006），最後美軍租金上漲二百萬美金，並且承諾吉國大量金援。2009 年，吉國故技重施，單方面拒絕美軍使用境內的空軍基地，但吉國總統又隨即公開宣稱歡迎美國提出新的基地租借方案，此次談判

結果讓美國支付的租金上漲了三倍有餘（Nichol 2009）。這些例子都顯示聯盟成員可能用公開宣示的方式迫使盟國面對問題或接受解決問題的方案，公開宣示可以回應群眾要求，或是凝聚政治支持。

## 伍、結論

本文試圖瞭解同盟成員在何種情況下容易產生公開爭端，而這些爭端對聯盟關係又有何意義。盟友間出現歧異在歷史上並不罕見，這些爭執經常被認為是盟友進行安全合作時偶然出現的摩擦，或是盟友間懸而未決的歷史恩怨的延續。當同盟關係走向盡頭時，論者常會追溯到盟友在同盟期間發生的外交衝突或領土紛爭，以顯示聯盟關係正走下坡。這些看似並未決定聯盟命運的爭端究竟重不重要，是本文最想探究的問題，如果這些爭端值得我們重視，那麼又是什麼原因導致爭端出現？

本文的實證分析顯示，同盟爭端的產生並非偶發，並非特定的人或事使同盟合作出現問題，進而釀成爭端。爭端背後存在結構性的因素，同盟內外的變動，一則使盟友重新評估同盟的價值，二則產生新的可能的同盟組合，兩者都可能令盟友急於重新找回繼續維持同盟的理由。盟友會挑起爭端，不純粹是因為政治外交上的衝突，而是聯盟無法再提供足夠的安全利益，盟友希望能改善同盟合作，增加同盟的安全規模收益。

本文發現外部威脅的升高與盟友間實力差距的擴大，是造成盟友提出公開爭端的因素。另外，將爭端公開可視為聯盟內博奕的策略。以博奕角度而言，民主國家最容易將爭端浮上台面，以顯示決心或以公眾意見為談判後盾，驗證結果顯示民主國家組成的同盟確實較容易出現公開爭端。最後，本文以存活分析檢視公開爭端對於聯盟關係的長遠影響，結果並不樂觀，曾出現公開爭端的聯盟，以失敗收場的風險遠高於不曾有爭端

的聯盟。

公開爭端的影響絕不僅限於盟友之間，潛在威脅會關心聯盟的可信度，公開爭端必然影響潛在敵國對聯盟關係的判斷，究竟敵國會視爭端為安全合作必經的波折、是分化同盟的好機會、還是認為同盟即將失敗，進而發動外交威脅或軍事行動？本文並未直接分析第三方對於爭端的反應，但就目前得到的結果來看，第三方的判斷可能傾向後兩者，同盟爭端對維繫安全合作有負面影響，那表示爭端可能給予敵國可趁之機，不論是分化同盟或是各個擊破，對於外敵來說都是誘人的選項。但是回過頭來說，盟友可能相當清楚這種風險，可以想見的是，許多不重要的爭端都透過聯盟建立的溝通管道解決，唯有較核心、較重大的爭端才會公諸於眾。這裡呼應了本文的主要發現，公開聯盟爭端的出現是由於結構性因素所導致，而非特定的聯盟義務或架構所衍生，同盟爭端的出現並不尋常，公開爭端表示同盟的功能或是內部合作出現重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盟友間出現爭端時，除了維持目前同盟或選擇退出／不履行盟約之外，還能夠重新談判聯盟條約。以盟約為本的聯盟合作的特殊之處在於，合作通常訂立一定期限，盟友會在盟約屆滿之際重新審視彼此的同盟關係。若有必要，任一方可提出修改條約的要求重新談判。盟約再談判在聯盟政治裡並非少見，重新修訂後的盟約，可重新定義安全義務，讓同盟關係更符合成員的利益，不失為解決安全合作矛盾的方法。未來對於同盟爭端的研究，可朝向同盟如何藉由盟約再談判解決同盟關係中的問題，並藉由新約的簽訂延續同盟合作。



## 參考文獻

- 劉丰，2013，〈親而離之：分化對手聯盟〉，《世界知識》，5：48-65。Liu, feng. 2013. “Qin er li zhi: fenhua duishou lianmeng” [Dividing close allies: dividing rival’s alliance]. *Shijie zhishi* 5: 45-65.
- Altfeld, Michael F. 1984. “The Decision to Ally: A Theory and Test.”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7(4): 523-544.
- Bearce, D.H., K.M. Flanagan, and K.M. Floros. 2006. “Alliances, Internal Information, and Military Conflict among Member-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0(3): 595-625.
- Beck, Nathaniel, and Jonathan N. Katz. 2007. “Random Coefficient Models for Time-Series—Cross-Section Data: Monte Carlo Experiments.” *Political Analysis* 15(2): 182-195.
- Bell, Andrew, and Kelvyn Jones. 2015. “Explaining Fixed Effects: Random Effects Modeling of 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 and Panel Data.”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3(1): 133-153.
- Bennett, D. Scott. 1997. “Testing Alternative Models of Alliance Duration, 1816-1984.”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3): 846-878.
- Bennett, D. Scott, Paul Poast, and Allan C. Stam. 2017. “NewGene: A Conceptual Manual.” SSRN Scholarly Paper, ID 2596297. Rochester, N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https://papers.ssrn.com/abstract=2596297> (August 19, 2018).
- Box-Steffensmeier, Janet M., and Bradford S. Jones. 2004. *Event*

- History Modeling: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echer, Michael, and Jonathan Wilkenfeld. 1997. *A Study of Crisis*.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1975. "Measuring Systemic Polar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2): 187-216.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Bueno. 1990. "Pride of Place: The Origins of German Hegemony." *World Politics* 43(1): 28-52.
- Carter, David B., and Curtis S. Signorino. 2010. "Back to the Future: Modeling Time Dependence in Binary Data." *Political Analysis* 18(3): 271-292.
- Clark, Tom S., and Drew A. Linzer. 2015. "Should I Use Fixed or Random Effects?"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3(2): 399-408.
- Cleves, Mario, William Gould, and Yulia Marchenko. 2016. *An Introduction to Survival Analysis Using Stata, Revised Third Edition*. College Station, TX: Stata Press.
- Colaresi, Michael P., Karen Rasler, and William R. Thompson. 2008. *Strategic Rivalries in World Politics: Position, Space and Conflict Escala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awford, Timothy W. 2011.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5(4): 155-189.
- Crescenzi, Mark J.C., Jacob D. Kathman, Katja B. Kleinberg, and Reed M. Wood. 2012. "Reliability,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6(2): 259-274.
- Deni, John R. 2016. *Allianc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Restructuring NATO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UK: Routledge.
- Diehl, Paul F., and Gary Goertz. 2001. *War and Peace in International Rivalr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Dodd, C. H. 2010.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the Cyprus Conflict*. Basingstoke, UK: PalgraveMacmillan.
- Dreyer, David R. 2010. “Issue Conflict Accumul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Strategic Rival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4(3): 779-795.
- Durmaz, Mahmut. 2014. *The U.S. Arms Embargo of 1975-1978 and Its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urkish Defense Industry*. MA thesi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 Elman, Colin, Miriam Fendius Elman, and Paul W. Schroeder. 1995. “History vs. Neo-Realism: A Second Loo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 182-195.
- Fearon, James. 1997.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1(1): 68-90.
- Fordham, Benjamin, and Paul Poast. 2014. “All Alliances Are Multilateral Rethinking Alliance Form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0(5): 840-865.
- Fuhrmann, Matthew, and Todd S. Sechser. 2014. “Signaling Alliance Commitments: Hand-Tying and Sunk Costs in Extended

- Nuclear Deterr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8(4): 919-935.
- Gartzke, Erik,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2004. “Why Democracies May Actually Be Less Reliable All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4): 775-795.
- Gibler, D.M. 1996. “Alliances That Never Balance: The Territorial Settlement Treaty.”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15(1): 75-97.
- Gibler, Douglas M. 2014. *The Territorial Peace: Borders, State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rowitz, Michael C., Paul Poast, and Allan C. Stam. 2017. “Domestic Signaling of Commitment Credibility: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Alliance Form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8): 1682-1710.
- Hui, Victoria Tin-bor. 2005.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seph, Joseph S. 1997. *Cyprus: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Independence to the Threshold of the European Union*. Basingstoke, UK: PalgraveMacmillan.
- Kim, Tongfi. 2011. “Why Alliances Entangle But Seldom Entrap States.” *Security Studies* 20(3): 350-377.
- Knorr, Klaus, 1976.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Leeds, Brett Ashley, Jeffrey M Ritter,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 and Andrew Long. 2002.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8(3): 237-260.
- Leeds, Brett Ashley, and Burcu Savun. 2007.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Journal of Politics* 69(4): 1118-1132.
- Lepgold, Joseph. 1998. "NATO's Post-Cold War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1): 78-106.
- LeVeck, Brad L., and Neil Narang. 2017. "How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Matters: Revisiting Alliance Violations in Context."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43(5): 797-821.
- Lim, Darren J., and Zack Cooper. 2015. "Reassessing Hedging: The Logic of Alignment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24(4): 696-727.
- Long, Andrew G., and Brett Ashley Leeds. 2006. "Trading for Security: Military Alliances and Economic Agreement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3(4): 433-451.
- Long, Andrew G., Timothy Nordstrom, and Kyeonghi Baek. 2007. "Allying for Pea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Conflict between All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9(4): 1103-1117.
- Lupu, Yonatan, and Paul Poast. 2016. "Team of Former Rivals: A Multilateral Theory of Non-Aggression Pact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3(3): 344-358.
- Mandelbaum, Michael. 1981.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oz, Z., and B. Russett. 1993. "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3): 624-638.
- Marshall, Monty, Keith Jagers, and Ted Robert Gurr. 2002. "Polity IV Project: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02." Version P4v2002e. [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August 19, 2018)
- Mattes, M., and G. Vonnahme. 2010. "Contracting for Peace: Do Nonaggression Pacts Reduce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2(4): 925-938.
- McLaughlin Mitchell, Sara, and Cameron G. Thies. 2011. "Issue Rivalrie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8(3): 230-260.
- Mearsheimer, John J.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1): 5-56.
- Michael, Michális S. 2012. *Resolving the Cyprus Conflict: Negotiating History*.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Morgenthau, Hans Joachim, and Kenneth W. Thompson. 1985.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NY: Knopf.
- Morrow, James D. 1991.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4): 904-933.
- . 1994. "Modeling the Form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stribution Versus 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3): 387-423.

- Nichol, Jim. 2009. *Kyrgyzstan and the Status of the U.S. Manas Airbase: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Washington D.C.
- Osmonov, Joldosh. 2006. "The U.S.-Kyrgyz Military Base Negotiations." <http://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field-reports/item/11077-field-reports-caci-analyst-2006-9-6-art-11077.html> (August 19, 2018).
- Palmer, Glenn, Vito D'Orazio, Michael Kenwick, and Matthew Lane. 2015. "The MID4 Dataset, 2002-2010: Procedures, Coding Rules and Descrip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32(2): 222-242.
- Powell, Robert. 1999.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ressman, Jeremy. 2008. *Warring Friends: 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obert D. 1988.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3): 427-460.
- Reed, William. 1997. "Alliance Duration and Democracy: An Extension and Cross-Validation of 'Democratic States and Commit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3): 1072-1078.
- Renzi, William A. 1968. "Italy's Neutrality and Entrance into the Great War: A Re-Examina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3(5): 1414-1432.

- Schroeder, Paul W. 1996.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gnorino, Curtis S., and Jeffrey M. Ritter. 1999. "Tau-b or Not Tau-b: Measuring the Similarity of Foreign Policy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3(1): 115-144.
- Singer, J. David, Stuart Bremer, and John Stuckey. 1972.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 1820-1965." In *Peace, War, and Numbers*, ed. Bruce Russett.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Slantchev, Branislav L. 2005. "Military Coercion in Interstate Cris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4): 533-547.
- Snyder, Glenn. 1984.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36(4): 461-495.
- . 1997. *Alliance Politics.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hies, Wallace J. 1987. "Alliances and Collective Goods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1(2): 298-332.
- . 2003. *Friendly Rivals: Bargaining and Burden-Shifting in NATO*. Armonk, NY: M.E. Sharpe.
- Thompson, William R. 2001. "Identifying Rivals and Rivalrie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5(4): 557-586.
- Walt, Stephen M. 1985.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4): 3-43.
- .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eal.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MA: McGraw-Hill.

Weitsman, Patricia A. 2004. *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Entanglement in Public: A Study on Intra-Alliance Disputes in Security Cooperation**

**Ping-Kuei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why members of a security alliance raise disputes with their allies in public and the impact of such disputes on alliance relations. Allies sometimes have problems when they cooperate under a security alliance. Members of an alliance may have different views about how to enforce the alliance agreement; they may find their allies incapable of providing the security benefit they promised; or they may claim that their allies' actions are harmful to mutual security interests. Allies may raise disputes to address these concerns on alliance cooper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187 bilateral alliance treaties between 1945 and 2007 with original data on alliance disputes. The large-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ise of external threats, power preponderance between allies, and joining a democracy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members' decisions to raise public disputes. This paper further finds that public disputes increase the risk of treaty violations. Alliances that have experienced open arguments about security cooperation are less likely to be sustained.

Keywords: Security Alliance, Alliance Disputes, Alliance Management,  
Alliance Reliability, Alliance Relations

